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历史探源

梁中芳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苏联政府对犹太民族政策和长期的反犹运动是其现实基础,长期以来苏联犹太人的艰难生活处境是导致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

关键词:苏联;犹太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 K51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6)05-0201-0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约有 500 万犹太人居住在沙俄,接近世界犹太人口的 40%^{[1](P5)}。素以“各民族的监狱”而著称的沙皇俄国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十月革命终止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潮,犹太人在俄国的境遇彻底改观,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在斯大林的政治迫害下,大批犹太人被逮捕或处决,二战结束以后,又以反犹太复国主义面貌出现了新的反犹活动,直至 1953 年耸人听闻的“医生间谍案”成为反犹运动的顶峰。这种历史遭遇深深地影响了犹太民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作出新的抉择。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意愿在赫鲁晓夫时代有所显现,但规模不大,影响有限,直到 60 年代末,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才发展起来。从 1971 年开始,苏联在十年时间里约有 25 万犹太人移民出去,这个惊人的数字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本文试图从苏联对犹太民族政策、反犹运动以及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苏联政府对犹太民族政策

苏联政府对犹太民族政策,从列宁开始就一直坚

持民族同化政策。犹太民族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小民族,从 1795 年沙皇俄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两国第三次瓜分波兰开始,犹太人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就产生了一直没有解决的“犹太人问题”。在列宁的民族理论中,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将犹太人同化进苏联社会当中。虽然列宁一直倡导民族自决,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自决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民族的平等和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团结,而不是主张民族分离。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人类分为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要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2]在列宁民族平等以及同化政策的指导下,这一时期苏俄犹太人积极融入苏维埃文化当中,他们的社会境遇得到了很大改观。犹太人成为苏联的管理技术机构和政治、文化部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0 年代,犹太人只占苏联人口约 2%,但却占文化机关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总数的 16%,占学生总数的 14% 和科学家总数的 13%^{[3](P497)}。

斯大林时期延续了列宁时代的对犹太民族同化政策,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导致了其民族政策上的一系列变化。首先,其民族政策在反对民族

主义的斗争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改变,政府的压制活动主要针对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列宁时期广泛提倡的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惯例却不复存在了。其次,是苏联实行的国内证件制度。1932年底,苏联重新实行国内证件制度。个人登记族籍依据其“血统”,即据其父母的族籍进行登记,完全不考虑母语状况、宗教信仰和个人愿望。苏联的这种多民族证件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民族群体间划定界限的证件制度所独有的细致性、对民族的自我鉴定为民族阶层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很明显,民族阶层的规定和自我定位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进程,甚至会延续几代人。第三,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使得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官员在对犹太人的心态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许多犹太人担任了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据统计,当时在556名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有448名犹太人,占80%以上。由于犹太人在领导岗位上所占比例十分惊人,所以当时西方国家称年轻的苏维埃政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府”^[41]。在列宁时代,犹太人以及他们与国际的联系对于政府是如此的宝贵,所以那时大多数苏维埃的外交官是犹太人,而今,犹太人变得让人猜疑和不值得信任了。葛罗米柯曾说:“(不希望)我们的外交人员有私人的国际关系,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人。我并不是指犹太人不忠诚,只是他们的朋友、亲戚、熟人实在太多了。”^{[51](P91)}以色列成立以后,斯大林更加怀疑犹太人的忠诚,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对犹太人来说尤其不幸。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中心地带的犹太人才避免了遭受放逐的命运。

这些变化不仅为后来的苏联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从根本上使得苏联犹太人很难真正融入到苏联社会文化中去。苏联政府对待犹太人有着相当大的矛盾心理。苏联政府一方面鼓励犹太人同化进苏维埃文化中,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为犹太人完全融进苏联社会组织结构设置了诸多障碍。“苏联的犹太人在文化上是俄罗斯人而在法律上和社会上是犹太人。这个双重人格产生了内在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办法是或者整个成为犹太人,或者整个成为俄罗斯人。苏联当局造成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强迫犹太人受同化,另一方面又使它成为不可能的事情”^{[31](P537)}。这反映了苏联民族政策中关于犹太人的固有矛盾。斯大林曾使用激烈的手段去解决犹太人问题,使得犹太文化以及犹太教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

府又宣称苏联“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61],但犹太人对“新的苏联人”是持谨慎的怀疑态度的。一方面是苏联在高等教育、外交、行政机构、高级军事职位等方面对犹太人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得犹太人感到自己游离于苏联政治生活之外,很难融合进苏联的社会中去。而另一方面,犹太人的特性也决定了苏联政府基于大俄罗斯主义之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难以奏效。犹太人作为客居他国的“流民”,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受到主体居民的歧视和政府的迫害,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族更加团结,另外,这种与主流民族相对隔离而又集体聚居的生活状态使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同时,基于犹太教的精神文化联系更难使犹太人受到客居国主体民族文化的同化,正是这种难以同化的民族特性使苏联政府的同化政策很难真正对犹太人发生作用。

二、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现实基础

俄国对犹太人的歧视以及反犹运动由来已久,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犹太人在历史上屡遭歧视迫害有三个原因。首先,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他们一直是一个漂泊世界的流浪民族,为了生存,他们必然要和当地居民争夺有限的土地、财富和机会,因而常常成为各国种族歧视和迫害的牺牲品。而犹太民族不易为其他民族所同化的民族特性又加剧了这种迫害的程度。其次,由于历史原因,犹太人的就业和经营受到很大限制,他们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边缘行业,不少人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富商和贪婪的放债者,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最后,对犹太人形象的偏见也是反犹排犹的一个因素。“犹太人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与众不同的民族,其形象和举止行为总有许多怪诞之处”^{[71](P160)},犹太人经常被描绘成这样一副模样:“黑头发,窄长脸,小眼睛,短下巴,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大的鹰钩鼻,他们的身材往往比较矮小,有时还加上一双罗圈腿。这一形象看上去总是给人一种阴险、奸诈的感觉”^{[71](P164)}。而“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81]。这里的反犹寓意自不待言。

苏联政府的反犹运动是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现

实基础。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和民族自决的自由权,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在一个长期对犹太人有偏见的国家里,短时间内反犹是很难消除的,在1926年-1930年党和国家努力同反犹运动作斗争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列宁曾在1926年声称:“俄国的知识分子……可能在今天比过去在沙皇统治下更反犹。”^{[11](P16)}斯大林在1931年初就曾作过一个强有力的同反犹现象作斗争的声明,他指出:“反犹主义,一种深刻敌对苏维埃政权的现象,在苏联要坚定、严格地制止。”这个声明在1936年《真理报》上再次发表^{[9](P309)},说明了在苏联同反犹现象作斗争的任务的艰巨。

在接下来的大清洗年代里,成百上千的人被处死或流放,犹太共产党人也难以幸免于难。二战期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联犹太人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但随着战后冷战的逼进,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认为以色列是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它们无力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在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一些依地语学校被关闭,大批犹太知识分子和作家被逮捕和流放。

官方的反犹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进入高潮。“世界主义者”是指苏联文艺领域里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被说成是一些没有国家的人,背弃和仇视俄罗斯传统。许多犹太作家和诗人因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有联系而被捕,不少人最后死在审讯室里。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第一次标志着对苏联犹太知识分子的公开攻击,运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1953年1月,所谓的“医生阴谋案”使得反犹运动达到顶峰,许多犹太人从重要的技术岗位上被撤换下来。整个斯大林时代历次反犹运动的结果,不但党中央、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真理报、内务部、外交部、军队、法院、检察院等重要部门的犹太人被清洗掉,就是工厂、企业及无数基层组织中的犹太领导干部,也遭到逮捕或被撤职。

在这些年里,苏联犹太人被官方展示的形象是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而在苏联,努力工作的犹太人,可以进入所有的职业和专门的领域,参与建设共产主义。因此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犹

太人已同化进人民大众之中^{[9](P311)}。

医生谋杀案被正式取消指控后,被指控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1948年被逮捕的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官方还声称在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没有犹太民族,也没有必要再谈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样,没有犹太人文化,因为他们已经同化,但同时,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偏见显然在增长。在二战之前,针对犹太个体和群体的歧视在苏联已人人皆知,在战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犹太人不仅很大部分从敏感的安全部门中被排除,在高等教育机构实行配额的原则也被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所证实,她在1967年4月26日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关于她的犹太朋友,“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是严格限制的”^{[9](P312)}。

苏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60年代初发动的反寄生罪和经济犯罪运动中,被审判的有很多是犹太人。在1961年的9起审判中有11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其中6个从名字上判断是犹太人。在接下来更多的审判中,超过100人被判处死刑,从名字上判断,超过40%是犹太人^{[9](P315)}。其实,在整个国家,犹太人卷入其中的比例应该还是比较小的,这就意味着,犹太人案件是挑选出来的,既是为了使犹太人成为社会罪恶的替罪羊,也是为了达到散布反犹思想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代,反犹主义言论基本上公开化了。赫鲁晓夫在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中承认,在苏联“还有反犹主义情绪,各共和国的土著居民……已经有了新的干部,如果犹太人想在他们之中占据最高位置的话,他们会生气的”^{[31](P535)}。而他本人的反犹思想也十分明显,他曾毫不掩饰地说:“以前党政领导中犹太人太多,……太多犹太人任职造成了反犹主义,因为一旦有一个犹太人当了领导,就会有一大群犹太人围在他身边。”^[10]

一般来说,不论是苏联官方还是私人都一致否认在苏联有反犹和对犹太人的偏见的存在,因为苏联宪法保证所有人的完全平等。犹太人在苏联,无论是在国内的身份证件上,还是在人口普查中,都是官方划定的一个民族,但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却否认他们民族的存在,而且剥夺任何一种促进他们文化发展的可能性。由于事实上的长期的反犹运动,使得恐惧充斥于许多苏联犹太人中间,他们表现出各种形式的焦虑,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工作和居住许可,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孩子被大学拒绝,还有一些人害怕斯大林黑暗年代的恢复。因此,当苏联允许部

分犹太人移民时,这些心存疑虑的犹太人选择了离开。

三、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

1964年,4667名苏联犹太人(主要是老年人)被批准移居以色列,这是苏联犹太人第一次获准移民^{[3](P538)}。以后苏联犹太人移民意愿有所显现,但规模不大,影响有限。赫鲁晓夫执政结束后,新的领导集团一度改变了对犹太人移民的态度,在“六五战争”爆发前的两年时间里共发放了4500份签证。平均每月发放150份签证^{[5](P34)}。柯西金在1966年12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对那些想与家人团聚的人,“道路是开放的”^[11]。这句话一公布,申请出国签证的犹太人数量猛增。“六五战争”爆发后,苏联当局中止了国内犹太人的出国移居工作。直到1968年,苏联“在1968年对捷克的军事干预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捷克的悲剧不仅震惊了全世界,也使苏联领导人的威信下降到了极其可悲的程度”^[12]。为了维护已被损害的苏联国际形象,移民局主动受理犹太移民申请请求,在1968年的最后四个月里大约有7000人申请移民签证,到1969年,申请人数几乎上升了4倍,到70年代,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时髦流行的词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犹太民族意识的再次觉醒、移民运动初期激发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外,还有如下一些因素促成了这次移民运动。

首先,苏联政府的对犹民族政策以及长期的反犹运动对犹太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冲击。1917年至1970年,犹太人在苏联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的提高,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两代人经历了系列的身份转型:从小贩成了医生,从小店主成了科研工作者,从工匠成了工程师。苏联犹太人的白领阶层特别是其精英分子,在二战以后要比以前多得多。无论如何,乍一看,苏联犹太人能更好地和周围的社会融合在一起,而且显露出比大屠杀以前更深的同化进程。然而,严格地说,因为大屠杀以及反犹运动,特别是苏联居民在其中扮演的排挤打击犹太人的角色,对苏联犹太人来说震惊很大,一些人开始担忧他们融入到周围社会环境中的程度。作为个体的犹太人,在一个缺乏任何犹太集体主义的体制中要面对痛苦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感觉自己并不是苏联社会的一分子,他摆脱不了和犹太民族的亲密关系,因为身份证件上记录下了他的民族;另一方面,他将自己视为这个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为这个社会贡献出全部精神和才华。因此他们被迫去面对这种矛

盾,造成内心极大的紧张。

长期以来,犹太人在教育及就业等方面的纵向社会流动受到限制。犹太民族是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民族,超过10岁的每1000个犹太人中就有239个受过高等(大学)教育,几乎是总人口平均数的4倍,犹太人是苏联的第十二大民族,而拥有科学博士的犹太人却占到了民族排名的第二位,仅仅次于俄罗斯民族^{[5](P15)}。苏联为减少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教育 and 人事制度方面实行了配额制度,即在高等教育就业和干部选用等方面让各民族占据与其人口在总人口中相一致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末配额制度向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发展,更加严重地影响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56-1957年,犹太大学生占苏联大学生总数4.2%,而到1978-1979年度,则下降到1.2%,下降了71.4%^{[11](P118)}。在1970年,每1万名犹太人中就有512人是大学生,而到了1979年,却跌到了329人^{[11](P119)}。在研究生招生上,歧视性的限额制度实施得更加严格。仅1970年至1975年,犹太研究生人数由4945人(1970年)降至2841人(1975年)。在培养机制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歧视,较之其他民族学生,犹太学生要承担繁重的和相当难度的科研工作和考试^[13]。从斯大林时代始,犹太人陆续被排斥在苏共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及外交、对外贸易、军事和其他所谓敏感部门之外,只能集中在科研和技术领域。根据1970年的统计,在莫斯科的科学家占据全苏联科学家总数1/4,而其中犹太人约占11%。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科学家所占比例为6%。到70年代末,知识分子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由60年代前半期的11%跌至5.5%^[14]。据“希伯来移民救助协会”[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HIAS)]所做的调查,犹太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上所受的限

制已经成为许多犹太人申请移民的直接理由^[15]。其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苏联同西方发达国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导致部分苏联犹太人移民国外的重要因素。犹太人擅长商业经营,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却不允许私人商业经营活动,许多犹太人不惜铤而走险投入黑市贸易,在斯大林时期抑或在赫鲁晓夫时期,都有一部分犹太人因“经济犯罪”而成为打击的对象。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进入长期的停滞和倒退期,1982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仅为60年代下半年平均增长率的44%,工业总产

值的增长率也由 8.4% 下降到 2.8%, 农业则维持 1% 左右的低增长^[16]。苏联在追求“超级大国”地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过程中,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其军事力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但综合国力却逐渐衰退, 生活水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 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呈下降趋势, 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与工业制成品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把向西方移民视作改善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由于苏联政府以及苏联领导人没有充分意识到

参考文献:

- [1] Mordechai Altshuler. Soviet Jew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1987.
- [2] 列宁选集: 第 2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19.
- [3] 泽夫·卡茨.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4] 唐裕生. 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J]. 世界民族, 1995, (1): 42.
- [5] Victor Zaslavsky and Robert J·Brym.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 [6] 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 [7] 肖宪. 犹太人: 谜一般的民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8] 王震. 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透析和近期回潮[J]. 国际观察, 2003, (5): 55.
- [9] Lione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0] 罗伯特·康奎斯特.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81.
- [11] Colin Shindler. Exit Visa. Déente, Human Right and the Jewish E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USSR[M]. London, 1987. 99.
- [12] 罗伊·A. 麦德维杰夫, 若莱斯·A. 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172.
- [13] William Korey. 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 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J]. Foreign Affairs. 1979(Fall).
- [14] Laurie P. Salitan.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1968 - 89 [M]. Macmillan, 1992. 95.
- [15] Robert B·Cullen. Soviet Jewry[J]. Foreign Affairs, 1986 - 87. (Winter)
- [16] 余伟民, 郑寅达. 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13.

The Historical Origins Research of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70's

LIANG Zhong-fang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began in the 1960s and caused extensive concer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its development. The cause of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has its historical origins: The Soviet Governmental policy on jewry and the long-term anti-jewry movements wa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the long time difficult living situation of Soviet-jewry was its psychological reason.

Key words: Soviet; Jewry; emigration

[责任编辑 孙景峰]